

毛泽东 邓小平 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国防大学 2 070 2844 7

毛泽东邓小平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编撰.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12

ISBN 7 - 5073 - 0715 - 8

I. 毛… II. ①中…②中… III. ①毛泽东思想 -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 研究②邓小平理论 -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 研究 IV.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75345号

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编 著 /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

责任编辑 / 张 宁

封面设计 / 张 戈

版式设计 / 郑 刚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邮 编 / 100017

销售热线 / 63097018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北京金剑排版厂

印 刷 / 北京安泰印刷厂

装 订 / 广增装订厂

850 × 1168mm 32开 19.375印张 480千字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1000册

ISBN 7 - 5073 - 0715 - 8/D · 163 定价: 40.00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	胡 绳(1)
从十五大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逢先知(26)
不尽长江滚滚来·····	龚育之(37)
学好理论 振兴湖南·····	郑培民(4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毛泽东邓小平的 历史贡献·····	杨胜群(58)
对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 意义的再认识·····	沙健孙(68)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中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探索·····	李君如(78)
关于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关系论断的考察·····	杨胜群(88)
十五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的 概括与升华·····	余品华(9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和创新·····	庄福龄(107)
六届六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冯 蕙(11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论纲·····	陆剑杰(131)
总结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梯·····	何梓林(144)
延安整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作用·····	王文珍(153)
毛泽东、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毛况生(16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王中杰(172)
“结合”根据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哲学思考·····	唐秉仁(181)

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结合”的结构·····	李 吉(193)
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观念及人格塑造·····	夏远生(203)
党的三代核心领导人治国理论基本 特征初探·····	石柏林 王慧文(213)
毛泽东、邓小平对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 巨大贡献·····	许先春(222)
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国家力量的认识与实践·····	徐双敏(231)
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刘利华(24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与奠基人	
——毛泽东·····	郑德荣(250)
略论毛泽东思想之历史地位·····	金春明(259)
毛泽东与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	陈雪薇(267)
《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主要贡献·····	雍 涛(276)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命题改造的前提、 实质和意义·····	王兴国(286)
简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学风·····	雷国珍(296)
战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 的理论认识·····	林蕴晖(306)
论建国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实践与经验·····	郑昌华(314)
毛泽东关于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时限估计考略·····	鲁振祥(323)
超越自我：从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 改造新道路·····	李 捷(334)
试论毛泽东的道德伦理观·····	边彦军(344)

道德中心问题的科学解决——重温毛泽东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唐凯麟(354)

毛泽东对“三农”现代化的探索与农村

改革实践的验证 郑有贵(363)

毛泽东股份合作经济思想产生缘由探析 ... 徐 黎 张国新(373)

毛泽东群众组织工作中“交换”思想的

形成与发展 聂正安(382)

毛泽东 1958 年推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缘起 许 蕾(392)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对平均主义的

认识和纠正 卢 洁(401)

毛泽东与“七千人大会” 张素华(413)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

三次思想分歧 杨明伟(423)

毛泽东、周恩来等为实现台湾与大陆

和平统一的贡献 杨瑞广(434)

毛泽东与对藏工作“慎重稳进”的方针 曹志为(445)

毛泽东与新中国对美外交战略的确立 宫 力(453)

毛泽东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 迟爱萍(463)

毛泽东的美国观与新中国“一边倒”国际

战略的形成 刘建平(47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的四大特征 刘湘溶 周发源 刘云波(48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实现的

原因与意义 黎青平(491)

论邓小平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态

度和方法 包心鉴(500)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进程	王怀超(510)
在历史转折过程中邓小平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	程中原(518)
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创新	毕剑横(526)
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陆魁宏(535)
试论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	唐洲雁(544)
论邓小平“台阶式”发展思路的形成	
及成功实践	朱 地(554)
邓小平对机构改革的探索与贡献	彭国甫 王身余(563)
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石——邓小平民主法制	
建设的理论	张世珊(573)
人民利益和人民意愿是邓小平决策思想的最	
高价值标准	周发源(583)
从“一国两制”方针的产生看马克思	
主义的中国化	张宏志(592)
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利用资本主义思想	
的重要贡献	王若素(602)
后 记	(612)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

胡 绳

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进行再评价，当然不是说，要推翻过去的评价。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完全符合国情的指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理论，已在实践中得到完全证实，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完满典型。但我觉得，学术界过去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评价还有些不够，它有一个方面的内容还未得到充分重视，因此有再评价的必要。

—

为讨论现在要谈的问题，我想从毛泽东是不是带有民粹主义的思想说起。这个问题，恐怕是由研究毛泽东的美国人首先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思想很严重。对他们的这种看法，国内的学者有人同意，有人反对，有人说要分析研究。我认为，至少在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即大体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9年到1949年，毛泽东不但没有丝毫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反对民粹主义的。他不仅仅在口头上反对，而且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鲜明地、坚定地反对民粹主义。甚至可以说，虽然过去我们党内有些同志表示反对民粹主义，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毛泽东是我们党内的

第一人。

首先，我想引用毛泽东讲过的几段话，这些话可以表明，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对民粹主义，为什么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在中共党内反对民粹主义有很重要的意义。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发表《论联合政府》的重要报告，他在此前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作的说明中指出：“报告中……，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①

七大开会时，因为已经把《论联合政府》印成书面报告发给大家，所以毛泽东没有再照本子念，而是作了一个口头报告，来解释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其中提到“民粹派的思想”。他说，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国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接着，毛泽东指出，民粹派最后变成了反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他说：“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②

毛泽东的这段话牵涉到俄国革命时的一些问题。社会革命党在俄国革命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这里不作讨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就被斯大林终止了，现在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看法，有人提出，新经济政策是不是停止得

过早？对这个问题，也不作讨论。我只想指出，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像俄国的民粹派，对消灭资本主义不能急，太急了不行。

民粹主义思想的内容，在毛泽东的这段话里也交待清楚了。大家知道，民粹主义是19世纪末在俄国出现的一种思潮，列宁、普列汉诺夫花大力批评它。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从封建经济，也就是从小农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表面上看起来，民粹主义者非常反对资本主义，热心于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他们的这种主张是行不通的、是错误的。毛泽东的两段话都指出，民粹主义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并不是说俄国民粹派的思想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那时也许我们党内很多同志并不知道俄国民粹派，而是说由于中国革命在广大农村内进行，大多数党员是农民出身，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党内容易产生实质上类似于俄国民粹主义的倾向。

我介绍的第三段话，是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④那时，革命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我们开始进入中等和大的城市。新华社在同年7月发表了一个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上述这段话（文中有“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个表述），新华社解释说：“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华社的回答还引用了历史上的例子，指出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是抱有这一类

思想的。新华社还解释说：“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内，土地改革后农民中一定程度的阶级分化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小生产可以建设起来的，而是必须依靠社会化的大生产，首先是工业的大生产来从事建设。……要达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农业，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大量地发展公私现代化工业。”^④这个“问答”用新华社的名义来解释毛泽东的讲话，很显然，是传达了当时中央的意旨。毛泽东的讲话和新华社的“问答”，在各路解放大军纷纷进入城市时起了很大的积极的影响。

从上面所引的毛泽东的三段话可以看出，民粹主义思想是可能从小农经济中自发产生的，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革命就会发生破坏工商业和城市的举动。试看太平天国的历史，那时的人们当然不知道什么民粹派，但太平天国明确地提出了，实际上也执行了一套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政策。他们在打到南京后，用现在的话说，一进城就“共了产”，把所有商铺的财产都分门别类地收归军队所有，实际上就是消灭社会上存在的工商业。太平天国也主张实行一种农业上的绝对平均主义，按照人口来计算，平均给每一个人分多少土地，规定每一家人能有多少财产，能养几只鸡等，多余的财产都要交公。虽然太平天国的这套主张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实行，但可以看到，这就是在中国农民中自发产生的民粹主义思想。所以，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全国解放的前夕，毛泽东特别提出绝对平均主义的问题，提醒全党注意，而且加上一个“农业社会主义”的称呼，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后来编《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为什么删去这个称呼，未听到过权威的解释。大概是因为“反对农业社会主义”很容易在字面上引起误解，使人以为是反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确实，到了革命大军进城时，绝对平均主义成为急需注意的

问题。如毛泽东所说，农村中流行着一种破坏工商业，分配土地主张绝对平均的思潮。在旧中国，私营工商业差不多都和土地剥削有联系。当城市不在我们手里的时候，地主逃到城里，农民就没办法了。当时城市已经解放，如果农民纷纷进城分地主财产，就可能导致破坏工商业、破坏城市的后果。在分配土地上不能采取绝对平均主义，若在城市实行绝对平均主义，那就更加有害了。看来农业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比绝对平均主义含义更多，突出地显示了要不要发展工业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要不要工业、农业和其他方面的现代化的问题。

这里说的是全国解放时的情况。那么在此之前，在农村打游击，搞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时期，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重要呢？不，这个问题同样十分重要。中国革命中有许多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用民粹主义思想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在长期的中国革命进程中，党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沾染一些民粹主义气味？是不是能杜绝民粹主义？是不是因避免民粹主义而走向相反的另一极端？需要认真研究。实践证明，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中国革命就顺利；解决得不好，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

中国革命说得长远一些，可以一直追溯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那时候，中国先进的人们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使中国前进，走什么道路呢？他们认为，应以西方国家为师，走资本主义道

路。在那时，这种主张是唯一进步的主张，如果能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变成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是个很大的进步。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制度的弱点在世界上充分暴露出来，大不吃香了。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这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只有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有一些学习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这时期有过一场论战，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一些人反对讲社会主义，起来跟他们辩论的是陈独秀、李达等人。有的党史书上讲那时有三大论战，其中就有这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一般的叙述是说，社会主义是新生力量，论战一展开，社会主义论者就把资本主义论者打垮了，“得胜回朝”，好像容易得很。但是仔细看一下论战的材料，并不是那么简单。梁启超、张东荪大致是说，中国现在太穷，很弱，受列强的压迫，经济十分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实行社会主义呢？他们说，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民、游民，工人很少，还不配讲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当务之急应该是发展工业，这就只能靠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的党现在不需要，且等将来才有用。陈独秀等人立即起而反驳。这些为维护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先进分子的勇气可嘉，但他们还没有真正从中国的情况出发进行研究，因而只是说，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已经没落了，社会主义如日中天，再讲实行资本主义就太落后了。发展工业，不必靠资本主义，直接实行社会主义，更能发展工业。这样说，并不能真正驳倒对方。驳梁启超等人恐怕应该这么说：中国现在的确还很落后，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要先解决当前最迫切的反帝反封建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发展经济，以后才有可能实行社会主义。可是反帝反封建靠谁呢？要靠人民大众。这个革命，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不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

导，因此社会主义思想在革命中能起指导作用，以社会主义为宗旨的党在革命中有重要地位，这个党先搞民主革命，而以社会主义为远大目标，等等。当然，不能责怪陈独秀等人，那时他们不可能说出这一套来，这一套是经过后来长期的革命经验才能说出来的。梁启超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大家都应当一心一意奔资本主义。为反驳这种观点，显然要有较多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否则，只是斥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声讨资本主义的落后性，借以论证中国应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那就实际上染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家很快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进一步的认识。这时候来了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教员”。他们满肚子都是马克思主义，就向中国共产党人说，你们现在还年轻，力量还太小，现在还不能独立干什么，要和国民党合作，先搞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将来才能自己搞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并不相信，不愿意照这样做，后来觉得老大哥的话不错，就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人也就开始懂得了，在中国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必须先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可是，当时俄国和共产国际的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都不真正了解。他们教条主义地看问题，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就一定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共产党现在只能去帮助国民党，等到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了，共产党才有自己的“戏”，现在只是帮忙、跑腿，甚至于当苦力。其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并没有能够比较彻底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来中国的这些俄国人以及共产国际的专家，误以为蒋介石、汪精卫的国民党代表着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果国共合作还没有取得全国政

权，蒋介石、汪精卫已经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和他们并肩协力，反过来屠杀共产党人了。党史书上说，党在这时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个错误在中国党内应由陈独秀负责，也是在共产国际和俄国人的指挥棒下造成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从根本上是出于这样的估计：既然中国是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领导权应属于资产阶级，政权也主要由资产阶级执掌。这种想法固然避免了民粹主义，却走到了和民粹主义绝对相反的另一错误极端，是和中国实际不符合的，既导致革命惨痛失败，也解决不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关系问题。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这番大挫折后，又站起来重新开始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左”的情绪，中国共产党人不甘心再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为不如干脆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候，俄国的老大哥又起了一点教员的作用。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斯大林亲自出面，指出中国现在还是要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有高潮、低潮，现在是低潮，以后还会出现高潮。老大哥对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懂得多一点，说服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又发展了起来。

这时发生了两个问题。当时的革命主要是党在农村中组织农民武装、打游击战、开辟根据地。共产国际和俄国领导人历来看不起这种农村斗争，认为共产党长期陷在农村中是没有前途的，甚至会改变自己的性质。那么怎样才能快些进城呢？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似乎已全部离开以至反对革命，那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怎么搞下去呢？共产党的目的是社会主义，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究竟怎样连接起来呢？脱离中国实际的共产国际和俄国的领导人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他们很自然地倾向于争取赶快进城，并且尽早地实现革命的转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受共产国际和俄国人的影响而产生的。

这里提供一个材料为例。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说：“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应该加紧全部力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准备在一切或几个工业中心的政治大罢工。”“中国革命的当前阶段是带着（他们不明确说‘是’，而说‘带着’——引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但“和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是“因为工人与农民是在直接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任务”。“它在取得胜利时就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中国的民主专政将不得不一贯到底地没收中外资本家的企业，不得不实行很重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这些话很明显地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在民主革命阶段就要实行重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这个决议还说：“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期限，将比按照俄国1905年革命条件所预料的，要大大缩短”。“中国国内的经济条件提出非资本主义进化的必要”，也就是“苏维埃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⑤。这些话显然在当时中共党内很容易煽起一种“左”的情绪，以至形成“左”的路线。

从当时“左”的路线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不只是反帝反封建，还要一般地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哪里呢？主要在大城市。李立三、王明路线的领导，都承认当时要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只好先在农村搞武装斗争，但是在那样落后的农村中谈什么反资本主义，未免太可笑了。所以他们都不顾条件是否成熟，急于攻打大城市，以便进一步结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二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反对任何“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什么呢？实际上

主要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李立三、王明认为，革命一发展到大城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要立刻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李立三在那时说过的这句话可谓典型：“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绝不会有丝毫的间隔。”^⑥而且那时的李立三认为，只要拿下一两个省，就是“革命胜利的开始”。30年代前期“左”倾错误的结果，大家知道，几乎葬送了红军和中国革命。

30年代前期这种“左”倾机会主义，人们很少讲它和民粹主义的关系。这种“左”倾论调并不表示对小农经济的崇拜，这的确是和民粹主义不同的，但可以说，它的基本性质是类似于民粹主义的。因为它以为可以在经济很落后的情况下，即普遍存在着小农经济的情况下，一下子将民主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去。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联系着批评民粹主义时说，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在这方面是过急了。他所批评的这种急性病，是从30年代遗留下来的。

三

遵义会议纠正了党的“左”倾错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地领导党进入抗日战争。这里讲一点个人的经验。抗日战争开始时，我刚刚参加共产党，当然完全拥护党采取国共合作的方针，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当时头等的大事。但是心里不能不怀疑，现在同国民党合作，抗日胜利后中国到底变成什么样子，怎样变成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实在不懂。我就请教一些老同志，和他们讨论。老同志说，咱们当然是要搞社会主义，抗日战争的结果将是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讲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这很